

政治學理論

與方法論
Q&A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Methodology**

彭懷恩譯著

D0

200523.2

彭懷恩譯著

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論

Q&A



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

政治學叢書

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論 Q&A

譯著者 彭懷恩

出版者 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杭州南路二段15號5樓

電話：2396-0261

傳真：2391-3712

西元2003年3月初版

定價/450元

劃撥帳號/1952-0505

電子郵件: emegabook@ebtnet.net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論 Q&A / 彭懷恩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風雲論壇, 2003[民92]

面 ; 公分. - (政治學叢書)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0416-47-5(平裝)

1. 政治學 - 研究方法 - 問題集

570.31

92001997

一版序

編寫「政治學方法論」一書，是我多年來想做的大事，但始終找不出時間將過去二十年所發表的相關論文，做有系統的整理與改寫。所幸，在一九九八年八月開始，終於享有一年的休假，可以完成這本書的寫作。基此，我要感謝世新大學校長成嘉玲博士，因為她所建立的「休假制度」，使我有機會完成了多年的夢想。

一九七一年我進入台灣大學，先後選修林正弘教授的「邏輯」、王曉波教授的「哲學概論」課程，即關注「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領域，藉研讀波柏(Karl 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著作，使我進入了經驗主義的世界，並一度成為實證論的信徒。其後，在政治系研修呂亞力教授的「政治學方法論」課程，對於行為主義的研究方法，產生濃厚興趣，促使我在台大政治研究所完成所上第一位用電腦及統計方法研究政治行為的碩士論文，之後又參與胡佛教授的政治文化研究小組，將所學落實。

一九七八年我進入台大政治研究所博士班，決心將政治學方法論做深入的研究，次年，選讀袁頌西教授的「政治學方法論專題研究」，有機會研讀到溫區(Peter Winch)、孔恩(Thomas Kuhn)等著作，開拓知識論視野，使我逐漸脫離實證論的行列，追求新的思考架構。其後的二十年，我不斷的涉獵英美、歐陸不同學派的觀點，深感知識論海洋的浩瀚，自己所知的渺小，已不敢自跨可以寫一本有創見的學術著作。惟以編譯、寫作的方法，為我國政治學界提供參考指南，仍是值得追求的目標，本書就是初步的成績，當然，本書的缺失或可能的錯誤，是由作者負責。

本書的誕生不能不對一些先進、同儕、朋友表示感謝，首先是台大政治學系所教授胡佛、袁頌西、呂亞力等三位老師。其次是謝復生、朱宏源、朱雲漢

等同學的知識交流。其三，美國亞里桑那大學海頓圖書館所提供的藏書。其四，時英出版社負責人吳心健經常提供進口政治學的新書，也是本書的重要後援。

最後我要感謝終身貢獻教育的家父彭駕騁教授，他始終是我努力學習的對象。妻台芬的精神鼓勵，子書翰、書林的「另類支持」，亦是值得一書的。

彭懷恩 謹誌於翠谷

增修再版序

進入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當代政治學越來越重視此較政治研究，本書因應時代需要將《政治學方法論》增修內容而再版，新版除了增加比較政治的研究途徑外，另添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es）與女性主義的理論，希望擴大探討政治世界的觀點。

彭懷恩

誌於台北

2003/1/17

序論：當代政治學的發展

科學史的新觀點

時值跨世紀的歷史時刻，我們回顧廿世紀的政治學發展，不能不指其特徵是歐美文化霸權(hegemony)所主控下的政治知識體系。質言之，由於西歐及美國挾其物質文明的優勢，配合其帝國主義政策，使歐美文化擴散到非西方的世界。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半世紀，美國挾其國力優勢，政治學理論不免於有高度「美國化」的色彩^①。影響所及，許多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國家之政治學研究者莫不以美國政治學研究為主臬^②。以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運動為例，歐洲國家受的影響遠小於第三世界，因為歐陸國家的經濟結構（生產方式）雖然規模不如美國，但發展階段卻無殊異。相對的，亞、非、拉丁美洲國家既遜於物質發展，且受援助於美國，不可避免的就成為美國政治學的「殖民地」，形成了「邊陲——核心」的關係^③。

惟自七〇年代以降，東西關係解凍，歐陸國家自主性日益增強，原本即有強大傳統的文化體系再次展現充沛活力，反而對美國學術界形成強烈衝擊。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和解」來臨，馬克思學說（廣義）所蘊含著強烈批判精神及激進觀點炙熱了西方知識界，對政治學構成了另一次的挑戰。無論是政治心理學，政治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甚至政治學理論，都可以看到馬克思學說的影響^④。

借用科學社會學的觀點，科學不可能脫離社會而孤立發展，政治學亦然。

今日政治學的知識範疇無疑是反映了它所植生的社會^⑤。當社會結構發生變化時，政治學也不可避免的會隨之形變，借用普萊斯(D. Price)的「小科學、大科學……及其他」(Little Science, Big Science...and Beyond)的看法，就政治學的學術論文之「引證」或「註腳」，就可以追繹出不同時期主導政治學的思想是什麼^⑥。舉例來說，對諸如「美國政治學評論」(A.P.S.R.)、「政治學期刊」(Journal of Politics)等重要學刊之論文從事「質的分析」，比較六〇年代與八〇年代的學術著作及論文，就可很清晰看出政治學的確經歷了另一次的典範革命(paradigm revolution)^⑦。這典範革命顯然不能用「後行為主義」(post-behavioralism)來一語涵蓋。若是如此，仍是不脫離美國政治學的霸權影響，陷於實證主義的思維窠臼不能自拔。就如當代其他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的發展狀態相似，九〇年代政治學的形貌是「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⑧。

在此暫不對「後現代主義」做嚴謹的界定，但當代政治學者就政治學的「歷史圖象」(historiograph)從事分析，對政治學的發展，已跳脫了以美國為主軸的看法，而接受政治學領域「多中心」、「分歧性」的現象。就如伊斯頓(D. Easton)等學者所編「政治學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 Comparative Survey)一書所指出：

「二次戰後，大部分工業化國家，特別在西方世界，掌握了政治學的領域，而美國更是獨自建立制度化的政治科學專業組織。如一九四九年，只有四個國家政治學會參加新成立國際的政治科學協會。惟今日已超過五十個國家有政治科學的學會，以及在更多的國家中，政治學是非常活躍的發展。難以估計的著作、學刊、會議、研究機構若雨後春筍勃興。

雖然這領域的發展將加強政治學深度及多樣，但也帶來了分殊(fragmentation)、資訊過量(communication overload)，太多的研究途徑，學派衝突，黨同伐異。這使政治學做為一整體性的知識，已不能再謂之『進展』，也不再能繼踵前人的步伐，有自信的邁向未來。」

無疑的，政治學的「後現代」現象反映出各國政治學者開始從自身的「政

治發展」與「政治文化」中，建構出自己的政治學知識體系，這種趨勢即是顯示各國政治學的自主性發展。所以，當我們要了解某特定國家的政治學，必須先掌握其政治文化，就其文化的「脈絡」中來瞭解其政治陳述，才能從事有意義的溝通，進行政治論述(discourse)。就這角度來看，要想建立普遍性、世界性的政治知識，無異是海市蜃樓的幻想^⑩。

基此，政治學者開始思考政治學的「發展」。是否只是政治學者數目增加，研究產出擴大呢？就政治學的領域來看，確實有數量上的增加，而在這趨勢下，分工日益細密，形成政治學「專業化」的現象^⑪。但如何將這些分化的知識結合起來解決政治社會問題，就是另一個問題。

學者柏特森(Erkki Berndtson)歸納當代對「政治科學發展」的觀點有下列幾部分^⑫：

(一)「歷史」(histories)：

即學科歷史的描述，往往是代表領導主流的「個案研究」(case studies)，此觀點下，二十世紀美國及西歐政治學發展史往往被視為政治學發展史的全部，不是沒有原因的。

(二)批判性「歷史」(critical histories)：

此觀點注意到被忽視或被遺忘的學者及思想。以政治學為例，義大利學者格蘭西(Gramsci)的文化霸權論、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法國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等都被視為「非主流」的政治學理論^⑬。

(三)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

受到巴柏(Karl Popper)的影響，此觀點重視科學成長的分析，有嚴謹的實證主義色彩。在政治哲學方面，特別是對方法論(methodology)的發展，科學的哲學扮演最重要的功能^⑭。

(四)知識社會學：

在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影響下，科學史的學者注意到知識產生的社會背景，其後「科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ce)如墨頓(R. K. Merton, 1968)、

懷特 (W. H. Whyte, 1956)、布勞岱(P. Bourdieu, 1979)，都提出不同的理論來解釋影響科學發展的外在及內在因素^⑮。此外，孔恩(Thomas Kuhn, 1962)更是以經驗主義分析科學學術發展的典範現象，對科學史的貢獻極大^⑯。

(五)科學的政治(Politics of Science)：

就政治（權力）角度來觀察科學的發展，諸如蓋頓(J. Galtung)，以「支配」模式來解釋科學的發展中的中心與邊陲關係(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對科學發展的影響^⑰。至於科學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science)亦可包含在此類別中，即探討經濟對科學發展的影響。事實上，美國六〇年代重視政治心理學、七〇年代重視政治社會學、八〇年代重視政治經濟學都可和當時公私部門的獎助、社會問題性質、公共政策的取向有密切關係。

(六)詮釋學研究(Hermeneutical Studies)：

此觀點下，科學發展與科學語言有不可分的關係。如李革(P. Ricoeur, 1981)主張必須了解科學語彙的文本(text)^⑱。溫區(Peter Winch, 1958)重視意義的詮釋，並無絕對客觀，認知受到文化語言的限制^⑲。艾柯(Eco, 1981)更進一步提出文本的語意學(semiotics)重構(reconstruct)了文本的意義^⑳。

這些觀點都影響科學發展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的思想。

(七)馬克思主義學派分析(Marxist analysis)：

以馬克思的思想為主幹，以分析科學史又可分為幾個次類別：1.馬列唯物主義，是以歷史唯物論為獨立變項用來解釋階級關係、生產關係等。2.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結構主義，借用馬克思的結構觀念，兼顧意識型態的影響。3.「資本／邏輯學派」(Capital-logical school)，此派接近功能主義，企圖對不同的學科給予不同的功能解釋，即科學視為一種生產過程，切合社會的經濟結構而發生於成長^㉑。

(八)其他：

女性主義研究(Feminist studies)，如Lovenduski (1981)，代表對於科學發展

有其特殊角度的觀點，並非是主流看法²³。

綜上所述，「科學發展」本身就是一門可研究的主題，吸引了不少的學者從各種角度來探討學科的成長；問題的領域；理論、概念的發生；個別學者的貢獻等等，以此來了解科學的全貌。然而，就如「政治科學的悲劇」作者賴希(David Ricci, 1988)所指：迄今尚未有學者能提出一種研究學術發展的方法²⁴。基此，上述所介紹的觀察角度，也只是選擇性的，只能提供我們參考。

政治學的演進

海斯肯恩(Heiskanen, 1988)建議我們可以從下列幾方面來觀察政治科學的演進，頗具參考價值²⁵：

(一)學者企圖將學科(discipline)的「霸權典範」(hegemonic paradigm)予以合法化。就如美國政治學者將行為主義視為主流，強調其為探討政治現象的不二法門。

(二)研究者企圖說服政治學術研究的贊助者，提供財力的支持，如重要基金會支持那些政治題材的研究。

(三)從政治學著作的導言作者，著名教授的介紹文章中可以看出政治學的流行觀點是什麼？

(四)從批判角度，那些觀點企圖重新為政治學研究定位？

(五)研究知識發展的學者去詮釋政治學的歷史的嚐試。

(六)社會理論學家借著重建社會的思想史，嚐試建構政治理論。

由於當代政治學發展深受歐美的影響，所以我們要了解政治學發展的現況是不能不謂「制度化」的演進。再者，由於十七世紀以降的民主化運動在歐美國家政治體系都已有相當的成果，助長了政治學的自由發展空間，使政治學與民主政治互相增強。本節將簡述歐美政治學的發生與演進，自然這只是非常粗略，且經過選擇性的。

很難找到究竟是什麼時候，大學開始教授政治學。據考，西元一六二二年在Uppsala大學是已經有「政治論述」(discourse and politics)的課程，但不是集中焦點於政治學研究。在十八世紀四十年代，荷蘭大學亦開設了「政治與修辭」的課程，幾乎同時，歐洲許多大學都陸續開設了教政治學的課，政治研究逐漸為研究人文及社會現象學者所重視²⁶。

政治學之所以由美國獨領風騷，根據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 1988)的看法是因為民主政治的建立與發展在美國最為徹底。他說：「並不是有美國的政治科學研究，而是有民主的政治科學研究。」²⁷然而，因為美國代表了一個新世界，不同於歐陸的舊世界，美國政治經驗需要新的理論與解釋，所以，政治學不免有濃厚的美國色彩。

此外，由於美國大學制度在十九世紀末的結構變化，各學系的自主發展，進一步促成政治學成為單獨的學科。相對的，歐洲大學中，社會科學並未分化與專門化，社會學往往就含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等人類社會的不同領域，所以政治學就不易獨立發展。總之，在一八八〇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立了政治科學院代表了政治學研究進入制度化的里程碑，自此美國政治學飛躍成長²⁸。

雖然，在政治學領域中，美國學者的產量是一枝獨秀，但第二次大戰後，情況已有相當大的改變，歐洲學者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德國、義大利、法國、英國等國的現代化及民主化刺激了他們的學者關注政治現象的研究，並有其獨特的成就。

德國早在十九世紀末就有政治學與國家理論的學術辯論，但因為威權體制限制了政治學的發展，而使德國學者較重視公法學或政府學領域。第一次大戰後，由於威瑪共和的失敗經驗、納粹黨的發生與傾覆，使德國學者開始重視政治與法律之區別（權力對正義）。到了第二次大戰結束，美國佔領及其後東西對抗，都使美國政治學對德國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德國政治學隨著民主政治的建立而日趨成熟。

義大利亦是有政治學傳統的國家，早在十六世紀馬基維里的君王論(The Prince)就被視政治學的先驅，到了十九世紀末，柏烈圖與墨斯卡繼踵前人在政治精英研究有傑出成就。但政治學的獨立發展仍是遲至戰後，由於社會社會濟的需要（法西斯主義崩潰，民主政體建立），義大利大學結構的改變，再加上美國行為主義的外來影響，義大利政治學家開始轉向科學實存主義(scientific realism)，配合著對政治體制現代化的要求，引介了以科學方法如調查等，來研究政治現象。當代研究民主理論、政黨理論的大師薩托里(Giovanni Sartori)就是著名的例子，他結合了政治思想與經驗主義，擴大了政治的視野。

法國的政治學並未與民主化齊頭並進，主要原因是社會學誕生後，形成社會科學的「霸權」，將政治學排擠到公法學的領域，研究國家、政治、公共行政等問題，並不注重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來研究政治，而是以法律學的標準來處理政治事務，所以，法國憲法學研究有卓越成就。但我們必須了解法國學者受到其豐富政治思想的傳承，在政治理論方面貢獻極大，當代的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的政治思想是以法國為主軸。縱令在實際政治體制的研究方面，法國亦有其獨特之處，例如杜瓦傑的政黨理論，分析政治社會結構；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的關係，已成為二十世紀政治學的經典著作。艾宏(R. Aron)在國際政治方面的思想貢獻，也自成一家之言^⑩。

英國政治學的發展規模雖不如美國，但時間上可謂不相上下，早在一八九五年倫敦政經學院就已經產生現代政治科學，例如華勒斯(Graham Wallas)在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拉斯基(H. Laski)在政治制度上的研究，與美國齊步前進。但英國牛津、劍橋大學囿於傳統，一直是偏重政治史及思想的研究途徑，直到二次戰後，受到美國行為主義影響，英國學者在政治行為方面的論文急劇增加，使英國在政治心理學、政治社會學領域都有傑出成就^⑪。

當前政治學的發展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美國學者賴希(David M. Ricci)出版「政治科學的悲

劇：政治、學術、與民主」(The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Democracy, 1984)，對於政治學的發展深表憂慮，因為就政治思想的傳統，西方大思想家自柏拉圖以降到十九世紀的彌勒(J. S. Mill)、馬克思等都有卓越的貢獻，但是二十世紀政治學成為一門專業領域時，卻無法再產生偉大的政治思想家。雖然大學開設的政治學系是與日俱增，相對的，政治思想卻是日薄西山。在科學實證主義掛帥的美國學術圈，傳統政治思想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為當權者服務的公共政策，只強調工具性的價值，無法提供「政治」視為人類公共生活領域的知識體系，幫助導航者實踐更高價值如真理、善良、公平、正義社會³²。

當然賴希的看法是有感而發的，但以實證論為基礎的行為主義之缺點，在六〇年代末，七〇年代初就已經遭到了嚴厲的挑戰，這挑戰雖然沒有使政治學放棄科學方法，但對吾人認識的科學性質卻已有所修正，並改變了政治學的取向³³。

提出後行為主義的學者伊斯頓在發表的「美國的政治學：過去及現在」(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Past and Present, 1991)文中，回顧後行為主義產生的背景是源於當時歐美有所謂「反文化」革命(counter-cultural revolution)現象，即反映社會劇烈變化，如爭取婦女、有色人種等權利的運動；反戰示威；學生運動等，以及關心環境、反核、反污染等綠色運動，顯示出對工業化社會的反省與不滿。這些抗議就深度分析，也就是不滿社會科學不能預見社會問題的發生，亦不滿政治學不能解決問題。在此，不細述七〇年代歐美的社會運動，只是指出後行為主義的產生是受到外在環境結構變化，使社會科學家無法再孤立於象牙塔中³⁴。

惟對行為主義的批評仍是延襲西方知識的傳統，即人類行為極其複雜，涉及變項殊多，並不能用類似科學的法則予以解釋及控制。縱令自然科學也有測不準、不可預測的領域，何況如斯複雜的社會現象、人的行為呢？

行為主義被人批評的另一個問題是「價值祛除」(Value-free)，在六〇年代，

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曾以「意識型態的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來描述實證主義下的歐美社會科學^⑮。但反行為主義的批評者指出，所有社會科學都無法規避價值問題，而且不能否認的事實，歐美社會科學傾向於維護既有建制（如：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等）；所謂客觀根本是支持既得利益，「價值祛除」只是提供社會科學研究者迴避社會問題的藉口罷了！

所有這些對行為主義的批評最後匯成對行為主義的認識論(epistemology)及本體論(ontology)之全盤批判，引發政治學產生了孔恩所說的「典範革命」。這挑戰在科學哲學的領域來看，是以「詮釋」代替「解釋」；主觀的瞭悟代替客觀的觀察^⑯。追其思想源頭是受到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德國學者韋伯的影響。除此之外，馬克思主義對於美國社會科學主流——功能主義，亦提供批判性觀念的知識泉源^⑰。

行為主義為主流的時代，政治學者所致力的目標很單純，即將政治學科學化，到了後行為主義時期有了相當大的改變，由於對方法論的分歧，許多年輕學者開始懷疑；甚至批判政治學的主流，即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惟就整體而論，美國政治學界仍強調以科學方法研究政治，只不過科學的界定不再囿限於偏狹的實證主義，而擴及到更廣的科學實存論(scientific realism)，以及詮釋學派。

同時，政治學的研究範圍也不再侷限於政治體系的權力現象，諸如價值的權威性分配。由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重新被重視，使政治學重引入「國家」(state)，不再強調中性的政治體系概念。惟此國家觀念不是傳統的領土、人民、主權的客觀組合，而是重視國家機關如何運作於社會之中，即國家機關如何汲取社會資源？如何分配社會價值？如何選擇社會目標？如何執行公權力以領導社會發展？這並不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傳襲，而是歐洲學者從馬克思主義中汲取靈感所發展出的批判理論。人道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的（黑格爾式）馬克思主義、結構的（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這些思想對歐美的政治學形成相當大的衝擊，過去被實證主義所忽視的政治史、社會階級、意識型態、經濟結構等，重新納入分析政治過程的研究中^⑱。

行為主義時代，政治學者偏重於投票行為，司法、立法、行政的行為，且關心政黨、利益團體、發展（現代化）等主題，但在當代政治學者的研究領域中，已經增加到環境污染；種族、族群、社會階層、性別角色的平等問題，以及公共政策的領域。概括來說，後行為主義時期的美國政治學是「政策分析運動」(policy-analysis movement)，即運用政治學知識，對政策的形成與執行予以系統化的研究³⁹。惟因為研究途徑的不同，而有「理性選擇模式」(rational choice mode)與「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school)兩大派⁴⁰。

理性抉擇模式是傳承實證主義的精神，運用現代經濟學的計量方法來研究公共政策，前提是建立在人是理性的基礎上，政治行為與經濟行為並無二致，即追求最大利益，最小的損害，極大化價值目標⁴¹。此理性抉擇模式不僅可用於分析公共政策，且被政治學家羅斯(John Rawls)用於政治哲學領域書成「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以經濟學模型及博奕論(game theory)配合古典契約論(contract theory)，構成評估正義的判準⁴²。

相對於實證論，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政治經濟學影響，使學者重新重視經濟體制(economy)與政治事件之間的關係⁴³。值得一提的是，這關係是超越人的意志而左右到人的政治行動。借用馬克思的名言：「歷史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即反映一種結構性的制約關係，迫使政治過程朝向非自主方向發展。換言之，這是「非理性過程」，社會力量的產出影響到政治角色和制度的選擇及行動。由於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並未發展出如實證主義一致的方法論，因此究竟如何掌握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除了實證論的觀點外，韋伯的詮釋（瞭悟）被廣泛引用⁴⁴。令人混淆的是，韋伯一直是馬克思的批評者，他的唯心論與馬克思的唯物論格格不入，但當代批判理論的支持者卻企圖結合馬克思的哲學與韋伯的方法論來對付行為主義。無論如何，韋伯學說對當代政治學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許多批判論者都是採用韋伯的方法論來質疑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惟我們要了解當代反實證論並非以韋伯為唯一的思想根源，胡塞爾的現象學、沙特的存在主義、李革(P.Ricoeur)的詮釋學(Hermeneutics)、高芬柯(H.Garfinkel)的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都有其獨特的觀點⁴⁵。

當代政治學是很困難加以介紹的，因為政治學一直處於高度變遷的狀態，不能以簡單的方向或獨霸的典範予以概括。惟就主導政治學的重要學者來論，採用經驗主義的科學觀點仍為主流，即注重從經驗世界中的政治現象中，歸納與比較政治事實，從而獲得足以解釋政治的知識。但這並不意涵著實證主義仍是一枝獨秀，因為科學知識的意義已有所改變，不再是狹義的實證論所主張的客觀觀察方法。換言之，自一九二〇年代維也納學派（即邏輯實證論）以降，到六〇年代政治行為掛帥的科學哲學，已經到了改絃易轍的階段。政治學不一定要借用數理為架構的模式才能解釋政治運作，也不必凡事都納入理性抉擇模式下才能理解。倘若類似系統理論(system theory)有助於政治分析，自可繼續使用。相對的，我們也必須了解數理模式的侷限性，政治學仍有巨大的空間不是實證論的科學方法所能窮盡的^{④⑥}。

在八〇年代以降，英國伯明罕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倡導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政治學；特別是在「比較政治」的領域之影響力愈來愈重要^{④⑦}。它使政治學者了解到欲建立政治學的「大理論」(grand theory)已成為愈來愈不容易的工作，因為各民族國家的文化如斯複雜，人類的行為之意義是如此的多義性，政治行為所立基的文化既然不同，豈能發展出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呢？雖然，比較政治大師艾爾蒙(G. A. Almond)與鮑威爾(G. B. Powell, Jr)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當代比較政治：全球鳥瞰」(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A World View, 1997)仍主張以功能主義為架構的比較方法^{④⑧}。惟這種「大理論」的企圖受到「文化主義者」的批評，視為徒勞無功的工作。相對的，愈來愈多的政治學者開始從事「個案研究」，即以個別國家或對某政治事件（如政黨、利益團體、政變、革命等），從事深入的探討。也許，這並不能滿足某些政治學者的欲望。惟相較於行為主義時期產生一大堆空泛、抽象的數理模式而言，這改變是助益於我們掌握各國的政治變遷與發展的。

註釋：

①呂亞力，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一九九一年版，頁廿二。